

为普及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知识,促进长江文明溯源研究,系统展示长江文明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弘扬长江文化、传播长江文明,宣传长江流域关键遗址的系统发掘与综合研究成果,提升考古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助力考古发掘和大遗址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文物报社与长江考古联盟于2025年11月18日至20日举办“2025年中国文化遗产公开课——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高级研修班”。

兹刊登本次研修班讲座纪要,因篇幅较长,故将其分为两期刊出,以饕读者。

苏家垄遗址研究与展示

方勤

本文重点介绍曾国考古发现,尤其是苏家垄遗址的研究与展示情况,阐述曾国历史、考古成果,以及遗址展示的重要意义与具体方式。

曾国考古历史与成果

曾随之谜的提出与解答 曾国考古是湖北的重大研究项目,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掘以来,学界始终在探寻曾国的来龙去脉,李学勤先生曾提出著名的“曾随之谜”。近年来的系列考古发掘实证表明,曾国的历史跨度可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铜器铭文中之所以称“曾”,是因为“曾”是周王朝分封时确立的国号,主要用于记载重大事件;而文献中写作“随”,可能与地名相关,也可能是为避免与鲁国的“曾”相混淆。这些发现也证实了曾国就是随国,成功解答了“曾随之谜”。要讲好曾国遗址的研究与展示,首先需要梳理清楚曾国考古的历史脉络。

1978年曾侯乙墓发掘后,学术界提出了“曾随之谜”。李学勤先生指出,考古发掘揭示的曾国在文献中并无记载,而《左传》中却有随国的相关记录,这引发了关于曾国与随国关系的讨论。实证解答:近十年来,随着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枣树林、文峰塔、曾侯乙等系列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将曾国的历史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尤其是枣树林遗址中曾国国君墓葬出土的随侯铭文,以及曾侯乙编钟与文献记载的对应,证明曾国就是随国。

曾国考古遗址分布与特点 曾国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枣走廊,这里是为人所熟知的沮水流域,其上游被称为沮水,有源水、澧水、澧水和均水四大主要支流,下游又称府河,从汉口谏家矶汇入长江。叶家山、郭家庙、擂鼓墩等著名遗址均汇聚于此。此地位置特殊,既是长江流域南北通道的核心节点,也是连接黄河流域的重要交通枢纽,且通过桐柏山与大别山之间的隘口可直达信阳。

曾国考古遗址系列呈现了与曾侯相关的考古发现。该区域作为南北交通要道,涵盖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文地岗(含枣树林、文峰塔)、擂鼓墩等遗址。其中涉及多位曾侯,包括西周早期的曾侯谏、伯生、曾侯伋,春秋早期的曾侯鲜白、曾侯仲子蓀父、曾伯奈。春秋中期的曾公求、曾侯宝、曾侯得,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曾侯舆、曾侯郢、曾侯乙,以及战国中期的曾侯丙等。各遗址对应不同时期的曾侯,为研究曾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各阶段考古发现与特点 西周早期叶家山墓地:为曾国早期高等贵族墓地,已发现包括曾侯谏、伯生、曾侯伋在内的多位曾侯墓葬。其中曾侯伋墓保存完整,未经盗扰,出土的编钟等青铜器组合齐全;其余墓葬亦出土了大量带铭文的青铜礼器。结合附近的庙台子遗址(可能为曾国都城)来看,该墓地的发掘为探索曾国始封、早期世系及周代礼制提供了关键材料,相关都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开展。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郭家庙墓地与苏家垄遗址:郭家庙墓地安葬着曾侯鲜白、曾伯倚等四代诸

侯。其中,曹门湾一号墓规模宏大,出土了瑟、建鼓以及用于悬挂和支撑编钟的箎簾等大量音乐类文物。尽管其他大型墓葬被盗严重,但仍有重要发现,例如郭家庙M21出土的曾伯倚钺,这件器物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曾伯倚壶均为曾侯曾伯倚所制之器,苏家垄有曾侯仲子蓀父、曾伯奈所制之器。

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义地岗墓地和擂鼓墩墓群:出现了曾侯宝、曾侯得、曾侯乙等多位曾侯,曾侯舆编钟记载了吴国攻打楚国、楚昭王逃到随国的历史故事,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分析曾侯墓葬组合关系,曾国历史转变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发生在文峰塔墓地时期。而曾侯丙墓到了战国中期,是该处墓地中最晚的一座曾侯墓葬。

曾国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从西周早期到春秋中期,曾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与楚国的关系也从战争到融合。如曾公戊时期,青铜器铭文记载了曾国从辅助周王朝转变为辅助楚王。楚国扩张时对曾国的战略安排,反映了其政治地位的变化。

苏家垄遗址的研究与展示

苏家垄遗址的重要性 1966年,苏家垄遗址出土曾侯仲子蓀父的铭文,引发了对曾国考古的关注,2026年将是苏家垄遗址考古60周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苏家垄遗址发现大型曾国青铜冶炼遗存,出土铜锭、炼炉与“曾侯仲子蓀父”、曾伯奈器群。曾伯奈是“金道锡行”铭文董的主人。这是“金道锡行”线路上首次发现高等级诸侯国级别墓葬和矿冶遗址,表明苏家垄遗址与“金道锡行”密切相关。曾伯奈的铜器铭文记载了“金道锡行”四字,表明该遗址在当时控制了铜和锡的运输通道,矿冶遗迹证明曾国直接掌控矿产的冶炼与分配。

“金道锡行”将长江流域的铜锡送到中原,为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殷墟等地的铜就来自安徽、江西、湖北等地。赤壁大湖咀炼锡遗存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金道锡行”的存在。国家博物馆的曾伯奈董器群,明确其出自苏家垄遗址,对研究“金道锡行”意义重大。

苏家垄遗址的地理位置与水系 苏家垄遗址位于大洪山和桐柏山之间,离安居和随州较近,且位于大洪山的东南麓与余脉的丘陵岗地间,具有易守难攻的地势。

遗址周边的水系,如沮水,其下游叫府河,注入长江,同时还有支流均水,水系再往北能进入汉水,表明此地交通便利。

苏家垄遗址的考古发现 1966年出土97件青铜器,其中包含九鼎七簋,两件带有“曾侯仲子蓀父自作彝簋”铭文;另有一对铜壶,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湖北省博物馆。关于苏家垄遗址的研究与展示工作,需将其置于中国考古与历史的宏观背景下展开。

2014年开始对苏家垄遗址进行发掘,揭露了整个墓地,发现了曾侯仲子蓀父的车马坑和曾伯奈及其夫人夬克的墓葬,出土了五鼎四簋、三鼎四簋等器物,反映了春秋早期礼制的变化。曾侯仲子蓀父的车马坑也



已揭露。M79为曾伯奈墓,其夫人墓为M88,该墓保存完整,其中发现了一对记载曾伯奈控制淮夷和管控金道锡行内容的铭文铜壶。

春秋早期出现鼎簋与鼎簋两套组合,变化约在公元前670年曾伯奈的前后。曾侯乙墓出土礼器体现不同时期的特点,战国早期曾侯乙用九鼎八簋加五鼎四簋并非越制。考烈王用九鼎八簋及若干鼎簋确定为楚王的最高规格配置。曾侯乙受楚王恩宠,规格较高,用了九鼎八簋,但只用五鼎四簋组合,远差考烈王的九鼎八簋,不僭越。

曾侯仲子蓀父车马坑的发掘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坑内共埋葬七辆马车,与郭家庙墓地所见的马车形制不同,其车厢上均设有棚盖。经过系统的复原研究,这七辆车构成了一个功能完整的车队,很可能分别承担先导、警卫、正车、殿后等不同职能。这一配置与《礼记》中记载的“遣车七辆”礼制高度吻合。结合当时曾国面临的外部形势,学者推测,正是由于外患压力,曾国格外注重以规范礼制彰显身份、凝聚人心。该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曾国的政治处境与文化选择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曾伯奈的相关器物,包括鼎、簋等,在造型与纹饰上仍保留西周晚期的风格,但其年代实际已属春秋早期。这些器物上铸有铭文,其中“曾伯奈”三字尤为关键。铭文内容记载其“克敌淮夷”的事迹,并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曾伯奈壶上“金道锡行”的铭文相呼应,共同印证了曾国控制当时重要铜锡资源通道的历史事实。

该墓地除曾侯仲子蓀父、曾伯奈及其夫人夬克的墓葬外,还发现了曾太师、曾太祝、曾太保的墓葬。其中“曾太祝”是掌管祭祀的官职。值得注意的是,太师、太保等“三公”职官通常仅设于周王或诸侯国国君所在地。该墓地中“曾太保”等墓葬的发现,与诸侯公墓地规制相符,具有重要价值。

苏家垄附近河流上游叫沮水、下游叫府河。“金道锡行”路线涉及铜矿带,铜锡从南方运输,可能经随枣走廊到南阳盆地等线路。炼锡的来源有南岭、幕阜山等说法。此外,“繁阳”是重要的交换基地;“晋姜鼎、戎生钟”等青铜器铭文中,有关于用盐等物资进行交易的记载,可反映当时盐、铜等重要资源的交换流通。

后续工作及展望

持续推进考古工作:进一步加强苏家垄遗址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深入研究曾国历史和文化。

完善遗址展示:继续完善苏家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工作,增加数字化展示内容,提升展示效果。

加强学术交流: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线上学术论坛等活动,增进与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推进相关研究的持续深入。

恢复遗址水系:与水利等部门协同,在重要时段进行生态调水,实现对“金道锡行”相关历史水系环境的功能性复原,生动展现其与长江文明的共生关系。(作者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1986年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部根据含山县文物管理所提供的消息,首次来到凌家滩,他们来到村民坟坎挖出玉石器的地方,又走到裕溪河边,结合对地形地貌的分析,认为凌家滩是一处面积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较为重要,值得做考古工作。

1987—2007年前五次发掘

1987年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2个5×5米探方,发现了4座墓葬,其中87M1出土了3件玉人。最重要的是87M4的发现,出土了玉龟、玉版、玉勺、三角形玉饰、玉斧、玉瑱、玉珰等。另外,在T2探方中发现两座墓葬,也出土了少量玉瑱、玉环和石斧。

1987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对凌家滩遗址进行发掘。本次发掘紧邻上半年发掘位置向北扩展,发掘面积275平方米,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1座,出土虎首璋等360余件玉器,引起考古界及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1998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凌家滩遗址的第三次发掘计划。发掘区仍然位于墓地,具体在1987年发掘区的北部、西部和东南部,面积达1600平方米。同时,为了解生活区情况,在墓地东南边的平地(裕溪河北岸)发掘了225平方米,发现了一座红烧土基槽的房子。本次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29座,出土玉人、玉鹰、玉龙等玉器315件,发现一座祭坛(主要由石子层铺垫而成)。

2000年秋天,凌家滩遗址第四次发掘分为两处进行,主体仍是墓葬区。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20座,出土玉器、玉料35件。为了解凌家滩自然村中的大片红烧土分布区情况,在房前屋后揭露110平方米,了解到红烧土厚度在1.5米左右,认为是大型广场。

2007年,进行了第五次发掘,发掘面积约450平方米,具体位置在墓地的西北部和祭坛东部。在墓地西北部的主发掘区仅发现三座小墓。但恰巧祭坛南侧、87M4东侧有一片现代坟坎附近,在两座现代坟之间的狭窄区域(距出土玉人的87M1仅5米)进行发掘,王者之墓07M23就此展现在世人面前。07M23墓坑长3.45米,宽2.1米,头向南。随葬玉石器排列紧凑,局部层叠层压达2—6米。共出土玉器210余件、石器90余件、陶器20余件。

2008—2017年:探寻活着的世界

2008年起,在聚落考古成为研究主流的时代背景下,工作理念实现了从玉器到聚落的转变,总的工作思路是大范围区域系统调查、全面不留空白的钻探、准确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

区域系统调查(2008—2013年)对凌家滩及所在裕溪河流域进行了8次区域系统调查,调查面积达400平方公里。周边新发现9处同期或略早的遗址,面积多在1万至4万平方米,明显是以凌家滩为中心,证明凌家滩是社会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中心聚落。

勘探(2011—2014年)勘探面积200多万平方米,覆盖凌家滩整个岗地及周边平地。通过勘探,了解到凌家滩遗址有两道环壕,总面积约140万平方米。内壕内面积40多万平方米,主要生活区在岗地两侧,东侧平地叫“石头圩”,在西侧平地叫“石家圩”,石头圩区域分布了大量红烧土片区。

生活区发掘(2013—2017年)2013年,对岗地东侧石头圩地点进行发掘,揭露面积330平方米,发现一处红烧土建筑。2014年,对内壕西段进行解剖,确认内壕年代;对内壕北段进行解剖,发现与墓地之间的缺口。2015年,对岗地南端的“南半坎”地点进行发掘。2017年,结合遗址公园防洪工程建设,对外壕和南半坎地点裕溪河北岸进行发掘。2013年秋冬,对遗址东北两公里的韦岗遗址进行发掘。

上述发掘总面积1708平方米,虽然没有发现震撼的遗迹和精美文物,但基本了解了凌家滩聚落的布局和居址情况。

07M22墓葬清理(2016年)2016年建设单位在对墓葬区进行复原展示过程中,迁走了万民坟,考古队对墓坑底部进行清理,出土少量保存状况较差的玉石器,其中一件残断的虎首璋与1986年征集的残断虎首璋居然组合成一件完整的玉瑱。这些墓葬还出土了两件圆雕玉人残件,与之前站姿、蹲姿玉人的形态都不一样。

通过这一阶段工作,对凌家滩聚落的认识总结为:遗址面积140万平方米,有内壕、外壕、普通生活区,年代集中在5500—5300年,成为中心聚落,上下延续时间较短,外围遗址多在5700—5500年。玉石器加工为主要手工业,生

业经济方面,兼有水稻种植、猪狗家畜饲养,也有以鹿科为主要对象的狩猎行为和对莲藕等植物的采集。

纳入“考古中国”重大课题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五)

20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开始实施,“凌家滩遗址聚落形态研究”继续被纳入该课题研究(2020—2024)。同时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课题。课题学术目标是进一步揭示凌家滩遗址的聚落布局。对遗址进行了持续发掘和补充勘探。

发掘主要集中在3个地点:岗地东南端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墓葬祭祀区西侧地点、外壕北段地点。

2020年至2022年,凌家滩遗址主动性发掘地点均位于岗地东南端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2020年揭露面积500平方米,2021年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2022年发掘面积500平方米。通过发掘,确定了该大型红烧土遗迹的范围、堆积结构和年代,其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88米,东西宽40米。东北角被明清堆积破坏。现存面积约2700平方米,复原总面积约3400平方米。西界较直,边界内侧面大部分区域呈坑状,坑壁较陡(85度)。中部红烧土堆积普遍厚1.5米。在西北部红烧土堆积较薄区域底部为一房址,呈长方形,南北长11米,东西宽5.5米,西侧基槽内填红陶片、陶片和少量石块,区域边缘有柱洞式小坑。其西侧存在一处大型建筑台基,与红烧土分布区共同组成一处超大型公共建筑基址,总面积约5500平方米。

2021年10月至2022年4月,对墓葬祭祀区西侧休息广场区域进行发掘发现一处重要的燎祭遗存,共出土石器260余件,其中石器140余件、玉器70余件、陶器40余件。石器以钺占绝对多数,拼合后完整石钺60余件。玉器也有一些新器形,如齿轮形器、椭圆形牌饰、梳形器等。

2023年至2026年,继续对燎祭遗存西侧区域进行发掘,以研究揭示该遗存所依托的土台建筑的全貌,全面了解祭祀区的西界。发掘结果显示,燎祭坑依托于一处人工大规模铺垫的土台之上,推测垫土来自南侧的内壕开挖取土,垫土既有普通的黄土,也有内壕底部的大量石子层。发掘结果显示该区正好处于岗地的西坡处,原始地貌为斜坡低洼处,凌家滩先民遂将该区垫平,作为祭祀活动区域。

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对外壕北段地点进行发掘,了解了外壕的宽度、深度、堆积结构等。外壕位于岗地北端北侧,紧邻岗地。口宽45米,底宽25米,自深2米。南侧为岗地,岗地与外壕落差达6—9米,加上较宽的外壕,能够起到积极的防御功能。

凌家滩与中华文明 2023年12月,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探源工程新进展。项目研究认为,可将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

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凌家滩遗址同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中心性遗址。

凌家滩祭祀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复原当时祭祀场景提供了鲜活资料,完善了对墓葬祭祀区布局的认识;200余件器物的出土,丰富了凌家滩陶器玉器的种类;出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龙首形玉器等特殊玉器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其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是凌家滩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以大型红烧土遗迹为代表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的发现,深化了对凌家滩聚落布局的认识;证明凌家滩存在超大型的高等级的公共礼仪建筑,并且存在明确的祭祀功能;为大型墓葬、精美玉器的存在寻找到了相匹配的高等级的生活遗存。

结合凌家滩近年考古新发现,再综合考量30多年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凌家滩在以下方面的特点,已经表明它具有中华早期文明的部分特质:区域中心,大型工程,社会的分化,宗教的完善,礼仪的形成,高端手工业。尤其是大型仪式中心的营建,基于宇宙观的宗教观念和仪式,以钺为代表的世俗礼仪,加上玉器的技术和理念,均对此后良渚早期国家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凌家滩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和关键地点,是中华文明的先锋。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版责编:冯朝晖

张震 丁淑妍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新进展

王宁远

“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新进展,内容涵盖项目背景、区域文明进程、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旨在总结成果、探讨早期文明发展模式及未来研究方向。

项目背景与概况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是“考古中国”第一批项目,2019年底获批,2020—2025年实施,目前已准备就绪。

项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参与。

研究聚焦长江下游三省一市(安徽、江苏、浙江和上海)距今6000—4000年,对应考古学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阶段,处于社会复杂化转变关键期。此前当地考古学文化谱系已建立,项目聚焦崧泽、良渚阶段重点遗址研究,旨在提炼本地区文明演进模式,并与其他地区作比较。

区域文明进程的识别

区域文明模式基本框架 全球四次气候事件极大改变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长江下游文明进程研究成果,包括形成区域文明发展模式框架、明晰中心聚落特征演变、丰富良渚晚期社会认识。全球四次气候事件对文明的影响,如距今12800年农业革命、5500年文明出现、4200年良渚文化消亡。还说明5500事件使人口汇入太湖平原,带来台墩模式、聚落小型化和私有制,统一信仰礼制等结果,其中5500年气候事件促使稻作农业成为长江下游主要生业,人口向平原移动。

人口移动带来三点结果,一是出现适应于水乡环境的台墩模式,同时文化区复杂的地貌也呈现出区域多样性;二是稻作农业的产量也促使聚落规模小型化,导致个体家庭私有制产生;三是不同来源人群的汇聚催生了统一信仰与礼制形成。

良渚文化发展与聚落模式 5500年气候事件使稻作成主要生业。周边如凌家滩、东山村等遗址较高级,已具宫庙雏形。不同地区先进人群向太湖地区汇聚,带来技术与观念,促进其从崧泽晚期到良渚时期发展。同时,经济模式从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转化是

良渚文化在太湖平原出现的主要动因。5500年后,凌家滩等文化向太湖地区移动,与当地文化聚合,形成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核心区为太湖周边,其人群来源复杂,形成多血缘移民社会。

人群迁徙聚合形成多血缘移民社会,不同区域聚落模式及特点,如平原的台墩型聚落。良渚通过造神运动建立统一信仰与礼制,重点遗址有新认知,晚期形成完备都邑体系,且基层社会多元化,手工业类型丰富,多学科研究深化了对史前文明认知。良渚文化聚落模式包括水乡平原型的台墩聚落,纵向分布的岗地聚落以及山区的石角山城等。台墩聚落适应平原环境,聚落规模小型化且分布密集;岗地聚落位于山边,无需堆墩,金盩盆地的石角山城是山区发现的小城。

中心聚落结构特征与演变 通过对凌家滩、寺墩、福泉山、良渚等重点遗址的发掘,对其聚落结构有了新认知。如凌家滩聚落有祭坛、墓地等,寺墩墩台与良渚莫角山功能相近,福泉山、玉架山等聚落结构各有特点。

良渚聚落经历了从早期散点式分布到中期形成中心性聚落的革命性变化,5000年时建立莫角山仪式中心,水利系统也随之完善,晚期形成完备的都邑体系。

多学科综合研究

年代与谱系研究 基于碳十四和考古学文化分析,将区域文明概括为三个阶段、三个高峰。区域文明研究成果,将区域文明概括为距今6000—5300年、5300—4800年、4800—4300年三个阶段。环境研究复原杭州湾沿岸平原地形图;做石器、经济技术分析,如明确良渚古城资源来源、人口构成等。良渚古城类似现代城市,柘林遗址以稻作为主要生业模式。分别以凌家滩和东山村高级墓地营建、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营建、各区域多种经济多元化发展为代表。

环境与资源研究 通过与地质部门合作,收集3万多个钻孔,复原了杭州湾沿岸距今12000—4000年间,以800年为精度的10个地形图。

对良渚遗址群石器进行鉴定和来源研究,发现石料来自桐庐富春江流域,古代人在河道河滩取石,方家洲和沈家墩等地可能是采石和石器加工场所。

良渚玉器产地研究复杂,附近西苕溪谷地发现透闪石化石头但尚未发现采玉遗迹。余杭南部则发

现了蛇纹石玉的矿化地点。

经济与技术研究 通过同位素和DNA分析,显示良渚古城粮食、肉食等资源依赖外部输入,人口跨文化聚集。如城内稻米来自四面八方,猪骨头有三个来源,部分人骨与山东大汶口类似,还有人来自中原地区。

良渚人做漆器用的朱砂来自贵州和湖南,部分晚期陶器与江西樊城堆类似,显示出物资和人员的交流。

区域文明模式特点

发达的稻作农业促进江南地区开发和家庭私有制产生,良渚文化是移民社会,崧泽到良渚的社会变化类似春秋战国到秦朝的统一过程。

良渚社会形成统一的权力与信仰,产生王权,建立大型城市和礼仪制度,形成早期国家,玉器系统是其信仰和礼制的物化表现。

手工业生产高度专业化,不仅城市有高端手工业,基层聚落也有从事农业和玉石器加工的专业化生产。

研究意义与展望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为文明探源工程提供关键证据,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揭示早期国家产生的生动画面。对长江下游文明模式做初步概括,长江下游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稻米比重新高成主食后,长三角成人群移动目标,良渚是移民社会。崧泽到良渚社会变化类似春秋战国到秦统一的预演,良渚形成统一权力与信仰、王权、礼仪制度,建立早期国家,且手工业生产高度专业化、社会丰富。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重要性。文明探源工程制定文明标准及中国方案,关键证据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等遗址。目前长江下游区域研究结项,相比5年前,对过程性变化认知更清晰,揭示早期国家产生画面;重点聚落结构性研究提升,如对寺墩的认知更全面,对聚落整体性认知进步。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研究告一段落,目前研究虽取得成果,但各省份工作不平衡,后续需与长江中游、中原、海岱地区比较,开展整合性项目,后续或开展整合项目,以加深对中华文明多元文化面貌的理解。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